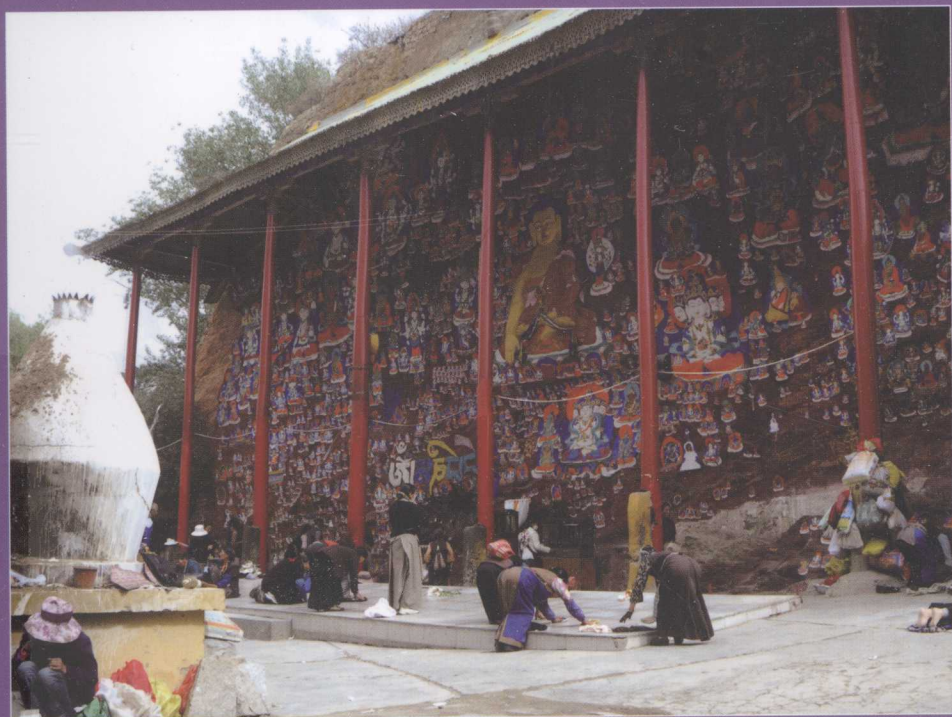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4

第14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9 年第 1 期

中国人类学评论

《人类学评论》编辑部 编 (1999 年 1 月)

第 1 卷第 1 期



1999 年第 1 期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4

第14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 14 辑/王铭铭主编.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12

ISBN 978-7-5100-1426-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592 号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4 辑)

主 编: 王铭铭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责任编辑:** 方 理 黄燕华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1-3086)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 邮编 102612)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 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ISBN 978-7-5100-1426-0/H · 27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1232263

学术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北京大学)
王东杰(四川大学)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邓正来(复旦大学)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永华(厦门大学)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
朱苏力(北京大学)
朱晓阳(北京大学)
齐 琨(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江华(上海大学)
张跃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
赵丙祥(中国政法大学)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
唐晓峰(北京大学)
徐新建(四川大学)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于华(清华大学)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
萧 梅(上海音乐学院)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剑波(中国人民大学)
彭兆荣(厦门大学)
蓝达居(厦门大学)
潘 蛟(中央民族大学)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

本辑主编助理

杨清媚 何贝莉 李金花

目 录

圆桌会议

“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实录)

汪 晖 王铭铭 崔之元 唐晓峰 李孝聪 荣新江 杨 镰
王连茂 杨念群 王建民 潘 蛟 龚 荫 郭丽萍 强世功
杨正文 刘正爱 舒 炜等 1

跨学科讲坛

Thoughts on Postcoloniality and Modern Chinese Religiosities
..... Mayfair Yang...107

追 忆

藏学家王尧教授访谈录 何贝莉...149

会议纪要

“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中的德国影响”读书研讨会纪要 杨清媚...180
“葛兰言、中国学与人类学”研讨会纪要 吴银玲...185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

环境的感知 Tim Ingolds...188

述 评

Asceticism: From World Renouncing to World Engaging
..... Liu Xiaoqian...190
通过罗杰的观点看——评《音乐与迷幻——论音乐与附体的关系》
..... 萧 梅...213
读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赵金虎...228

书 评

-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李安宅著 何贝莉评…248
- 《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
…………… 王 尧 王启龙 邓小咏著 李金花评…254
- 《李有义与藏学研究——李有义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 格 勒 张江华编 侯豫新评…259
- 《吐蕃政教关系史》…………… 石硕著 李金花评…264
- 《北方民族史十论》…………… 姚大力著 张友庭评…270
- 《藏学、人类学论文集》…………… 格勒著 徐振燕评…276

稿 约

圆桌会议

“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实录）

汪 晖 王铭铭 崔之元 唐晓峰 李孝聪 荣新江 杨 镰
王连茂 杨念群 王建民 潘 蛟 龚 荫 郭丽萍
强世功 杨正文 刘正爱 舒 炜等

“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为2008年12月6~7日中国文化论坛与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一次小型会议。该会由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王铭铭教授担任学术召集人，三联书店舒炜先生及中央民族大学杨清媚、伍婷婷等协助召集。与会学者有崔之元（清华大学）、唐晓峰（北京大学）、李孝聪（北京大学）、荣新江（北京大学）、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连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潘蛟（中央民族大学）、龚荫（西南民族大学）、郭丽萍（北京理工大学）、强世功（北京大学）、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刘正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本实录（由杨清媚等录音整理）反映了会议讨论的具体情景与内容，因技术原因部分内容有删节。

时间：2008年12月6~7日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主办：中国文化论坛、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第一场：导言

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名称叫做“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由中国文化论坛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汪晖教授和我作为召集人，实际是一个内部的、比较小型的讨论。今天董秀玉老师也在场，我们都知道她在三联书店培

养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术作者,而且这次会议非常荣幸地得到她主持下的中国文化论坛的支持。汪晖教授和我都很希望能听到她对我们说句鼓励的话,或者是批评的话。

董秀玉(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会议主席让我占用几分钟介绍一下中国文化论坛,这里有一些朋友对我们论坛已经很熟悉了,有一些朋友还不太熟悉。我从三联书店退休以后,和学术界的朋友还经常在一起,大家就想能不能每年都聚一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跨学科的交流 and 对话,能够就中国的重大问题做一些交流,我们跟李嘉诚基金会联络以后,他们支持我们这个想法,因而我们在2005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

迄今我们一共办了4次年会,主题分别是“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孔子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从前年开始,我们还在每年暑假办一个文化素质通识教育讲习班,每次邀请5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有重要建树的教授,面向大学中青年教师进行授课,就是说,按照中国教育的要求,这个课应该怎么讲,怎么能使学生在思想修养方面有所提高,等等。讲习班的反响也很不错,每次报名人数都大大超过招生数,所以我想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另外,每年除了一次大型的年会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小型的分会,这些主题很重要,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先开一下小会来做准备,像今天的会议,就是汪晖理事专门提议的。

中国文化论坛一共有11位理事:汪晖、陈春声、朱苏力、黄平、余永定、陈来、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甘阳、王绍光;另外还有些顾问,当时有费孝通、王元化——很遗憾这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还有杜维明、许倬云、韦钰、杨振宁、李泽厚、金耀基等。我们的制度基本上是每年由理事会提出当年年会的主题,由当年的论坛主席主持具体的工作。我们每年的主席都是轮换的,这样每一位学者都能参与讨论,除了理事以外,也有很多其他学者参与讨论,所以很希望大家以后能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我们有所交流。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王铭铭:很遗憾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因为身体原因来不了,葛兆光教授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来不了。今天来旁听的主要是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下面本来是安排汪晖的讲座,他客气嘛,让我先说几句,我今天也没有准备。这个会的安排是最后各个主题的理论的阐释,关于我们怎样能有更多的辩论,汪晖待会儿会有更全面的论述。我们大概有个设想,基于现在中国做了几十年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还有做了很久的区域史研究,把这两块东西对于中国史的整体叙述所构成的挑战,或者说它有什么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要做这样的探讨,就会请到相关的一些学者,实际上也是在这些领域里,甚至可以说

在中青年里面成为更主流的这样一些学者,像人文地理学、对外交流的研究。王连茂教授在其所在的博物馆也是做了几十年,在北京大学,像唐晓峰教授的人文地理学、荣新江教授的对外交流史研究都是做得非常精到的。怎样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讨论,能够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中国”是什么,我想是目前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到底怎么样重新认识“中国”这一概念,各有各的看法,最流行的一种看法可能是认为“中国”这个概念是近代建构出来的,这个看法当然跟以前的所有历史学家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也可能在国内会比较敏感。关于我们这个会,汪晖和我的主张当然并不是要简单地采用一个时髦的建构论或者后建构论的观点,而是更实在地看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国观到底在哪一块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对中国观也展开了很多反思,据我所知可能有两个阶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大概像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个在国内也是相当流行。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我感觉是相对后面另外一个论调更为扎实的观点,就是他要基于施坚雅的中国的区系理论来重新观看中国的历史,以中国的地区为中心来看,地区的分类,还有历史自己的规律来看。但是后面就出现了一大批后现代的历史学家,对费正清主导下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进行相当极端的或者说彻底的批判,在这种批判里面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很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多数恰恰跟我们今天谈的问题有关,当然其中一些反思性的著作,一些对费正清的批判性的著作,可能还是基于对中国整体的这个东西怎么理解,比如说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相当一大批的东西跟今天我们的讨论是有关的,也基于此,最近一些年,所谓的“border studies”在美国的汉学界得到了兴旺发展。这里面出现的一些研究,大概来说都跟帝制中国、中国的区域和边疆这三个概念紧密结合。

这个会一方面可以说是受这些转变的启发,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这些转变实际上导向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对中国历史叙述的重新思考和构想,而是因为诸多在我看来——我不知道其他学者是不是同意——很多后现代的、后殖民主义的叙述所使用的概念框架恰恰还是西方通常用的那种国家理论,这样就导致他们在论述中国的时候还是以国家为中心,而不是以地区,或者是更复杂的我们应该把它带上引号的“民族”这种论述。这是一方面。我感觉到这个会议针对的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国通史”。什么是中国通史呢?大家现在可能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一个称法,但是假如我们去看当今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现世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论述,我们会看到这个“通史”的概念实际上将遭到我们严重的质疑。所谓“通史”在华勒斯坦看来,是一种 National History,我们这里面涉及的民族史在这个

意义上也是 National History,但是这个“民族”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历史的产生相当晚近,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溯它的古代根源,把二十四史编入整个通史的素材当中——实际上是把以朝代为单位的历史纳入一个线性的以现代为关注点的民族的自我叙事,那么这种历史可以说是到今天为止,包括值得敬仰的许多老一代学者和我们中青年学者在内,仍然因袭的一个做法,就是认为有一个“中国通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对这方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但是并没有被纳入历史的主流叙述中去。

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研究,其一是区域史的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傅衣凌和梁方仲教授分别带动下的,本来是厦门大学 and 中山大学的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因为这个地方的学者更注重从当地出发研究非常细致的社会经济的进程。傅衣凌教授通过自己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对于解释中国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对于它的线性是否彻底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因此,他在“乡族理论”里提出了对封建的长期延续的这种接近文化解释的一种理论。这些东西影响了他的一批学生,包括厦门大学的杨国桢、郑振满、陈支平,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当然还有可能更接受梁方仲影响的刘志伟教授等。他们这批人提出了一种“华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座的杨念群教授也时常参与讨论——目前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说从一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的看法,同时它并不是以反思性为中心,而是基于地方史的研究进行历史的再叙述,做出了一些重要的作品。

其二,我觉得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绩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自己可以说读过一段民族史,但是我们在北京的主流学界对这块关注得不是很充分——所谓主流学界,是有一个中青年的话语圈子——我认为这块研究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深有启发: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一个民族和另一民族的关系的历史的研究,或者说这么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非常多,特别是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很多研究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的那些民族学家的论述传统,不断继承下来,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这次请了两位学者,石硕教授和赵心愚教授,他们两位可以说在民族关系史方面都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建树的作品,可惜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来。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研究,也是很有传统的,是在边政学时期开始就非常发达的,对土司制度的关注。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帝制下的间接统治方式,一直以来在社会科学里面并没有得到关注,但是在座的龚荫教授长期研究这方面,他的《中国土司制度》,非常厚的一本书,我的每个学生都要买去看的。这本书奠定了我们对于民族地区地方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也是有前人做的,早期学者做了很多开拓。土司制度研究近来也不可小视,不仅龚先生做了整个中国的土司制度研究,在各地,特别是南方的土家族地区、广西、四川,对各地的土司研究也是蓬勃发展,当然相比华南的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遭到了更多北京、上海学者的忽视,中山大学终归还是比较 central 的。这一块实际上也是非常遗憾地没有得到更多讨论。它的定义跟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直接相关的,我自己有一个在政治上不是很正确的看法,即今天中国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是有历史基础的,它的历史基础跟这个长期以来所谓帝制晚期实施的土司制度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政治没办法摆脱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对中国历史进行再认识,也会对当下产生一些启发,我觉得在这些意义上,把海外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演变和国内的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定的这个题目。

最后一点我想借机表达的是,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当中,不管是中国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都有一些最优秀的人致力于借“中国”这个所谓带引号的大个案,来构思一种社会理论,而这种努力今天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界已经被抛弃了,多数的社会科学家是在模仿西方的一些东西,老把国外教材当中的关键词用来核对,看中国社会现实里面到底有什么是跟它对应的。但是在此前呢,曾经有几代人致力于我刚才说的那项工作。当然现代早期的一些大学者,他们也有民族主义的嫌疑,但是他们的社会科学带有的那种很质朴的、试图从当地中国的经验提升出一个理论,这个努力是很值得景仰的,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在国外也不例外,我认为在法国年鉴派社会学的第三个阶段,就出现过这样一个以葛兰言(Marcel Granet)为中心的,试图以中国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的努力——葛兰言是涂尔干和布洛克(Marc Bloch)共同的学生——这样的人物在我们中国学界也长期被忘记。所以可以说这个会使我觉得很激动。我和汪晖教授、崔之元教授在商量的时候,带有这么一些零零散散的不大成体系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我说的葛兰言可能是错误的,我说葛兰言想在中国发现有一个普世的理论,比西方还普遍的理论,这是一个伟大的努力,我很景仰这个,可能恰恰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并不是说它在哲学上站得住脚。我们也有这样的反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目前的学界大多数是走香港的道路,所以我也坚持我这个说法是有价值的。因为有这个说法,所以很愿意跟学界同人一起讨论,在座的一些老前辈,有几个人让我说话有点紧张的,除了董老师之外,王连茂老师是我在泉州的老师,龚荫老师是大长辈了,他的书我们读了很多。这是一个内部的自由的讨论会,所以我斗胆在这里先发言,请大家不要见怪。我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汪晖教授对这个主题进行论述。

汪晖(中国文化论坛理事,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也是斗胆说几句。这

个会议的一个缘起,是去年夏天有一个机会去旁听王铭铭教授、王连茂教授主持的“西南与东南的人类学讨论”^①,完全是旁听,我是门外汉。听了以后,我觉得确实学到很多东西。过去我做过十来年《读书》杂志的编辑,在座的好几位都是《读书》杂志的作者,他们所写的文章,比如唐晓峰先生的研究、强世功先生最近写的香港的文章,我觉得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讨论有关系,因此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可能性。那时候我跟铭铭就一起商量,有没有可能把不同学科的学者找到一起,能够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其实在泉州的时候已经是西南和东南这两块的人类学者、历史学者的一个对话。后来我们商量能不能把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民族研究和包括政治理论的研究——比如崔之元是政治学的、强世功是法学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到一块来做一个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刚才王铭铭教授也说了,就是如何在一个新的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不太可能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加以单方面的论述的。虽然我们一方面看到,包括在座很多学者所写的书,已经有非常深的积累,很多创造性的共性,但是这些共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不被所有的不同领域的人所真正了解。我觉得如果通过一个对话,把这些问题重新提出来,可能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我们商量了几次以后,就决定开这么一个会,用中国文化论坛这个平台。我们一讲中国文化,就会讲儒家,诸如此类。可是各个地区、各个地方,也不仅是少数民族,包括各个地方的文化到底怎么叙述,再放到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框架下,都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条件。

那么具体到这个话题“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事实上关于这个课题,在我们决定要开这个会以后,我自己也重温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书,一方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新意义,另一方面这些领域其实积累很深,可以说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研究,不过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工作。今天上午帮我们组织这个会的舒炜先生——他也是中国文化论坛的成员——跟我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我们有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讨论,每一个学者的讨论都是从自己研究的特殊的领域出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上午把一些可能在不同领域当中相互都能勾连起来的问题,稍微回顾一下,以便于后续的讨论。我本来也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些天,我自己又重新阅读一些文件,作了一些归纳——而不是我自己的发明,我只是做一些归纳,也可能是完全不准确的,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能把一些话题勾连起来。

① 指的是2007年7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东南与西南——寻找中国人类学学术区之间的关联性”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人类学研习营,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区域这个话题？实际上区域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许多领域里很早就有区域这个话题。我们看一看到底当代为什么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波很大的浪潮，到 90 年代以后又是一波很大的浪潮，都在讨论这个区域问题，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想要做什么，就像刚才铭铭说的，其实里头是模糊的，一方面觉得有很多兴奋点，一方面又是模糊的，这才需要我们做一个讨论。我个人把这些主要的自觉要讨论区域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两种，一种是针对过去的，因为它有民族国家下的行政区划，所以一部分的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是为了打破在一个民族国家大的构架下的区域行政区划的构造，这一点在早期经济史和民族史研究里头都有很强的意识，我可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当然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里，一开始他就说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疆域的时候，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明显，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他说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经济层级，所以在他的引导之下，后来很多美国的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实际上是沿着这个方向来做的，要打破过去的行政区划构架，重新找到这个特殊区域构成的层级，这是后来他的大区的概念——我稍晚说到别的问题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个好像是美国 70 年代以后，特别是社会经济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打破行政区划的这个努力在民族史研究里头是很早很早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好像等到美国人再来发现的，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他说要提出一种不同于省区划分的地理单位。他说中国地区划分随着政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各个朝代出于一种行政管理的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划分中国的政治单位，各地区的面积主要取决于人口聚集的程度，聚集的地望又多半取决于移民迁徙的路线，因此政治单位的数量和面积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出他所谓的“我群”——就是他早期用的一些人类学概念，“我群”、“你群”——我群聚集地望的变动，那么显而易见寻找出某些决定着地望变动，而不是为地望变动所决定的地理划分，对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变动是有必要的。河流和山脉是人口流向的自然决定因素，其中河流的影响尤其重要，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民族史的研究已经在往这个方面走，只不过他当时的问题意识就是讲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所以他大概划分了 5 个大的区域，不包括现在的比如新疆、西藏这些地区，主要是中原的 5 个大区的划分。和这 5 个大区划分相匹配的也是他所谓的一些方法，主要用什么样的资料来研究决定了他的方法，比如说：人的体质的测量、城邑

的资料、姓氏的起源、人口的资料和各种其他的历史文献,等等。可见在地域史的所谓区域的研究里面,包括民族史、社会经济史,从不同的方向都很早就开始提出要打破这个行政区划的努力。

这种努力到了 90 年代——其实更早就有了,但是 90 年代到今天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大家都把这个区域跨出相对于民族国家的这个疆域,很显然这个跟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关于海洋的贸易路线,关于陆路的各种各样的路线,刚刚铭铭提到的华勒斯坦的全球体系里面包含着综合的各种各样历史研究的要素,其实在这一种地区研究里面,我觉得有一些特殊的主要的命题。一个命题我觉得是所谓的在欧洲统一进程里面提出的所谓“后民族”、“后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它这个“地区”很清楚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建置来的;另外呢,他们提出了跟这个“后民族”的概念相匹配的“区域整合”的概念,如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会提出像“文明圈”这样的概念,这些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的概念,这些年在中国影响很大,比如滨下武志的关于朝贡体制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努力,他要把整个东亚区域以朝贡作为框架建构成某种整体性构造、历史性构造。但是,这两种区域主义的叙述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无论是从民族史的角度,还是从交通史的角度,区域研究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打破了上述双重的边界,即行政区域的边界、民族国家的边界。所以,比如李济先生虽然是做民族史的,他有很强的早期的民族主义的史学的色彩,不过他也很清楚地说过一段很出名的话,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当然这些话完全是民族史的那个框架下的叙述,但是很清楚,即便在传统的民族史里面,过去人为的构架也是没有办法借鉴的,所以这两种叙述从知识上说,看起来他们论述上经常互相对立,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去看他们的具体研究的话,会发现相互的关联是非常多的。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区域和民族的问题。

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区域史范式被提出来以后,实际上它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里面牵扯到一些东西,我把它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点,我觉得是关于区域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决定的一个区域的相对稳定性。但是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意识到这个稳定性不过是一个相对的稳定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好像仅仅是一个地域决定的。不过还是有偏重于从流动性的角度理解区域和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理解区域的大致上的分别,但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意识,就是有些人更注重区域相对的稳定性,并不是认为它没有流动性;有些人注重流动性,并不是认为它没有稳定性。这两种趋向,我个人觉得在历史研究和其他的研究里头,构成了某一种问

题意识上的一些细微差异也跟历史时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历史学研究里面的例子,傅斯年先生写的很出名的“夷夏东西说”。他对夷、夏的看法,他说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一阵阵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治,但是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他说长江流域到东汉才大发达,到孙吴时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这个很清楚,他是把地域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下来做这个认识的。在这片大地当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线,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大体上有东西两个不同的系统。当然关于傅先生的这个看法,到底前头还有没有南北,这个可以说已经有不少的争论了,不过我们看他的方法,他是想要理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当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从这一点来说,他要追求某种稳定性,而且他后来又在文中说,分出东西南北这几个部分以后,这四个地理重心虽时隆时降——这是表示变化——但是其为重心,却是超于朝代的。换句话说:他不但是用我们刚才说的行政区划和民族国家,而且是朝代的变迁和地域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地域有它特殊的稳定性,超于朝代的变迁,一个朝代到另外一个朝代;他说认识这四地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或者是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史全形的。所以这个相对的稳定性对于了解一个历史的面貌,它有它特殊的重要性,很显然它的这个稳定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他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更把这个区域的形成,放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流变当中,所以更强调它的地域形成在流动关系当中的历史。我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桑原鹭藏的《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前头讲了东西,那我们现在说一说南北。其实大家对此都很熟悉,我把他提出来可以便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他是以南北关系来结构中国历史的,在这个结构上,它有特别大的一个历史跨度。在这个历史跨度里头,其中两个大的事件构成他叙述南北的最重要之框架——他称之南北变迁的中轴,就是晋室南渡和宋室南迁。他说最重大的事变,历史上称为“永嘉之乱”或是“晋室南渡”,是中国社会状态的一大改变,在各方面均引起重大影响,在南北中国文化分野的区划上,此事便是产生转变的一大原因。其实他这个也呼应了傅斯年前头的“东西说”的叙述,所以他说南方开发肇始于秦汉,因进士南渡进度加速,唐宋元明继其步伐,南方遂在文化、户口、物力等所有的方面凌驾于北方之上。所以他引用清初顾炎武以“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解释南北盛衰优劣交替的原因。这还不算,他认为这个还不够彻底,他引清末刘光汉(师培)将原因归为五胡南北朝时期北狄的侵入和汉族的南下,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他说在过去的1600年间,北方

夷狄和南方汉族的移入,这两个事实是解释南北盛衰原因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关键。在他这里,对于江浙和上述特别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的变迁影响,是受到两大事变的影响所产生的连续性的后果,这成为他所思考的中国南北问题,也就是连带的由事件决定,使得区域的意义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个是相对稳定、一个是相对流动的叙述,实际上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去理解一个区域的构成。

关于这个区域的构成,我觉得也是有两种虽然相互渗透、但表面上看来经常是互相对立的争论,我自己换了一个视野来读的时候,发现其实相互的渗透要远远多于表面上的对立。很多人在研究区域的时候,都区分区域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是研究区域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的构成是有它的中心和边缘的,这一点在我们看比如之前提到施坚雅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施坚雅说区域的结构包含着以镇和市为连接点的本地和区域体系的层级,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处在不同程度上整合成一体为中心地、层级的最高层,这个层级向下再延伸到农村的集镇。集市体系以这些集镇为中心,一般包括15个、20个村庄,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可以有很多讨论的。基本上他整个研究的结构,还是以大区的中心—边缘结构作为核心,好像认识区域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缘和中心的结构。但是这个中心—边缘结构在另外一些视野里面,很多人更要强调它的相对性,刚才铭铭讲“中间圈”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比如说费老提的“藏彝走廊”,到底它是边缘还是中心?这个区域是在藏族文明和其他的东部文明之间,他是放在文明传播的角度,但很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中心的。唐晓峰翻译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面谈“长城内外”也是一个例子,一方面它是一个边缘,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中心。那么我们在民族史里面看关于诸夏和诸夷的讨论,如傅斯年的研究,还有包括拉铁摩尔所综合的西方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研究这个所谓的流动性,相互之间的互动使得原有的过度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被打破。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有点像过去中国文化正统所建构的中心—边缘,他们是不断要打破这个区域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叙述里面,即便我觉得我们看到以中原区域的文明为中心,比如说过去在历史叙述里头有以黄河为中心的,转到比如以运河为中心的和以海洋为中心的,比如说日本的学者,另外一方面也还有像拉铁摩尔所做的以长城为中心的,还有现在比如说石硕教授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他不是从中国这个单一的视野,他是从藏文明为什么要向东发展,最终整合进来了一个相互连带的文明,一个大的文明,两个文明慢慢地变成一个相互勾连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之间的区域也就变成了一个中心的区域了,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称为边缘的区域。所以打